

1500 - 1800 年间的东南亚国家关系与华侨华人

——一种世界体系视角的分析

龙向阳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就世界体系思想而言,1500-1800年间的东南亚地区已被西方力量强行“嵌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正处于朝贡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两种世界体系相互竞争、利用与共存的复杂历史时期。本文试就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1500-1800年;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华侨华人体系发展特征;世界体系视角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6)01-0074-07

马克思主义认为,1500-1900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积累时代向自由竞争和垄断时代过渡发展的时期,也是世界史由分散性历史逐渐向整体性历史过渡发展的时期。从世界体系角度来看,公元1500-190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欧洲诞生并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时期。就东南亚地区来说,1500-1900年代是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与竞争的时期,即朝贡体系逐渐瓦解和落幕,及其逐渐融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逐渐“边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时期。就历史演变的进程来看,两种世界体系在东南亚地区共存与竞争的斗争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1500/1511-1800/1815年间东南亚海岛国家退出朝贡体系与部分地区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化”阶段,二是1800/1815-1900年间东南亚大陆国家退出朝贡体系与东南亚地区整体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化”阶段。[1]受篇幅的限制,本文将就1500-1800年间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与竞争的第一阶段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及其影响下的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

一、1500-1800年间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

1511年葡萄牙征服满刺加,占领了马六甲。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自然

收稿日期:2005-01-15

作者简介:龙向阳(1969-),男,湖南祁东县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 74 ·

发展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格局。大致说来,1500-1800年间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格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两种世界体系共存于东南亚地区,且在区域上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

1511年马六甲王国的灭亡是东南亚地区朝贡体系解体的开端。马六甲被占以后,满刺加国王曾派其叔向中国明朝求援,未为明朝接受,究其原因不过就是中国各王朝向无为朝贡国乞援而出兵之事也。另一方面,在1500-1800年间,当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进行殖民掠夺时,东南亚中南半岛上的两个大国缅甸和暹罗却为了领土而进行着内部战争,南面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他们似乎没有一点干系,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最初,在东南亚地区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竞争为主,其目标为争夺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它们以条约的形式确定各自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范围。早期葡萄牙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包括马六甲和香料群岛。1542年西班牙入侵菲律宾,1565年在宿务建立第一个东方据点,1571年建设马尼拉商城。之后,西班牙逐渐占领了菲律宾群岛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到17世纪初期,荷兰人开始涉足东南亚地区。1595年荷兰人到达爪哇,1598年在爪哇建立商馆,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9年荷兰人在万丹设立商馆,与葡萄牙相抗,1619年在爪哇建设巴达维亚城(即雅加达),1624年占据台湾。1640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1667年占领望加锡,自此荷兰人将葡萄牙人主要力量赶出东南亚地区。荷兰人对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东爪哇和香料群岛(即马鲁古群岛)的统治直到1800年后英国霸权的兴起。到1800年,东南亚的海岛地区除加里曼丹岛以外,分别为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力量所影响,其中马六甲、东爪哇、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等地区成为西方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海岛地区的其他部分虽仍保持独立,但其贸易和交通却受西方力量的控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冲击,东亚传统的朝贡体系所做出的反应是收缩再收缩。到1800年代时,东南亚的朝贡体系只保留在大陆中南半岛上了。两种力量在东南亚地区如此明显的地理特征分布,除了两种世界体系的新旧体制力量对比的差异以外,其与海岛和大陆国家的地缘位置(处于交通要道)、资源需求(香料和胡椒等)和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

(二)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影响、利用和斗争等诸多形式融入一体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影响的主要表现有:(1)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方式影响着西方东来以后的初期贸易方式。早期的葡萄牙在马六甲实行严厉的垄断贸易制度,对中国华商及其他国家的商人征收高额税率,进而破坏了马六甲的贸易中心地位,这也是葡萄牙势力在东南亚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①。在这之后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时都不得不“委曲”于朝贡制度。这种现象在当时西方打开中国贸易时也是如此。例如,荷兰和葡萄牙就分别于1655年(第二次的时间是1664年)和1667-1670年向中国进行“朝贡”,后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也作为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国而参与东亚贸易。也由此,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商馆,1728年法国在广州建立商馆,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到达广州。(2)西人力量的介入,不仅影响着朝贡体系的内容和形态,而且也影响着朝贡贸易的性质。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加入,扩大了朝贡体系“华夷秩序”中“夷”的范围,但缩小了朝贡体系中“夷”的数量。而且与中国朝贡贸易那种复杂的礼节相比,东南亚地区各国与西方的贸易就实际得多。另一方面,西方同东南亚地区直接贸易的加强,不仅弱化了东南亚外围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同时也改变了朝贡贸易的性质,使其由奢侈品贸易向大宗商品贸易发展。1720年代兴起并开始成为暹罗朝贡贸易新支柱的大米贸易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说明。[2](P11-23)

^① 1544年,葡萄牙控制下的马六甲的基本税率为货值的6%,但华人须缴10%,孟加拉人须缴8%。这样就使中国商人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转移到北大年和加里曼丹岛沿岸等地。参阅[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31页。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利用的主要表现有:(1)正如上文所言,西方国家利用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与东亚国家进行商业贸易,同时也利用此条件企图控制东南亚的大陆国家,但未有成功。(2)朝贡体系下的多数国家充分利用西方力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东南亚的大陆国家就充分利用“以夷制夷”的战略而维护自己的国家独立,或抵制外部力量的侵入和干涉。越南利用法国力量而排挤葡萄牙和荷兰势力的介入,柬埔寨利用葡萄牙人排挤英法势力,缅甸则利用英国力量而抗衡暹罗的侵略等。1680年代的暹罗也曾利用法国力量而抵制荷兰人的势力。中国的明朝也曾利用葡萄牙的力量而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中国的清朝也曾利用荷兰的力量而收复台湾等。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利用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两种世界体系相互斗争的主要表现有:(1)正如上文所述,在东南亚地区,大陆独立国家和西方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用和反利用的斗争,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延缓着这些大陆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力量的较量本质上是为了自己的独立,但在形式上也是维持朝贡体系。(2)作为朝贡体系的支柱——中国来说,面对西方力量的渗透,民间和官方的态度截然不同。官方政府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例如,1757年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而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大受益者——华商及华人移民却与西方力量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例如,16-17世纪活跃于中国东南沿海和东亚地区的郑氏家族为维护朝贡体系和建立自己的“海上商业帝国”就曾与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过战争或交涉。然而,由于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而发挥作用,所以这种斗争行为的意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大打折扣,无法与国家层面的关系相提并论。由于斗争双方地位的不平衡性,所以西人对华人的迫害事件不断发生。1593年、1603年、1639年、1662年和1762年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华人实施了五次大屠杀;1740年荷兰人对巴达维亚的华人实施大屠杀,引发“红溪惨案”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的目的是明确的,华人是为了商业利益和生存,西人也有商业利益之追求,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殖民统治。

(三)欧洲人在东南亚的侵略和互相争夺是他们在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中相互斗争的延续和反映

在1500-1800年间,欧洲列强自身的潮起潮落在东南亚都有明显的回应。例如,西方霸权自1500年代以来的序列为,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其后为荷兰,1740年后为英国。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侵略时序与这个霸权兴衰周期相一致,只不过在时间上略滞后一点而已。由此说明,自16世纪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对东南亚的进程影响是逐渐强化的。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中心是随着政治霸权的变动而转移的,这一观点在16-19世纪的东南亚地区也有类似的体现。例如,葡萄牙时代的贸易中心安特卫普之于马六甲,荷兰时代的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之于巴达维亚,英国时代的贸易中心伦敦之于新加坡等。

当然,我们仍然要看到,在1500-1800年间,东南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性。正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19世纪之前,亚洲(包括东南亚)“在同国际市场经济的关系上仍是一个‘外缘以外的地区’”。[3](P160)其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和格局也以自己的特色为主,西方力量并非处于主导地位。其一,当时的资本主义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其扩张的动力有限;其二,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主战场在美洲大陆,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活动以建立商站和控制贸易为主。总之,自16世纪西方力量东来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逐渐变得复杂化了,即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关系体系逐渐过渡到以西方资本主义宗主国势力主导下的条约体系之中,从而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也渐渐变得复杂化了。

二、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对华侨华人体系的影响

大致说来,1500-1800年间东南亚地区上述国家关系体系对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体系的影响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西方力量的介入刺激了华商网络和贸易的发展。在1500-1800年代,西方力量的介入虽然阻碍了东南亚地区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但就经济领域来说,由于早期西方势力的弱小,其介入并没有改变东南亚海岛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西人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建立商馆,在利用原有贸易网络的前提下,开辟自己势力范围的贸易中心和体系,其军事基地的存在仅起保护和形成威胁的作用。葡萄牙人统治东南亚岛屿之时,由于只进行收集商品的活动,不仅未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其实施垄断和苛刻的税率制度而破坏了该地区的贸易发展。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早期统治东南亚地区时期,对该地区的商贸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首先,他们在东南亚殖民地开辟新的贸易港口,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其他国家的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特别是吸引大量华商的参与,从而使马尼拉和巴达维亚迅速成为东方贸易中心。其次,他们开辟了新的贸易航线,特别是直接的东西贸易。16世纪西班牙人开辟的以马尼拉为中心的、连接中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也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华商网络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次,荷兰人向爪哇地区引进了新经济增长方式。17世纪下半叶,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1706年后又把咖啡种植引进爪哇。这些新经济种植形式不仅确定了荷兰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中的地位,同时也促进华商网络贸易的发展。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知,西方力量的介入,特别是东南亚海岛部分地区的殖民化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化等进程,使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和欧洲世界市场直接联系起来了,这一进程也同时使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不断融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和世界体系之中。即便如此,西方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仍以从事东亚区域内部贸易为主,而非东西直接贸易。所以,有专家认为,在17和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马六甲的直接统治,也仍然只是处在亚洲社会边缘的一个外来实体。[4](P389)

(二)西方力量的介入也刺激了华人移民的发展。首先,西人东来所创造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创造财富的机会无疑给华人的移民和原居东南亚大陆地区的华人再移民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其次,与西人的大力引进政策有关。西人进入东南亚后,在建设自己的商业中心和网络时,意识到华人在东南亚商业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所以早期的西人对华人移民的态度是积极和鼓励的。当然,当华人势力愈加强大且严重威胁到其控制的力度和范围时,西方列强便不择手段地对华人实施驱逐,甚至大屠杀。事件过后,列强利益衰落,西人对华人移民又鼓励引进。这种鼓励引进—驱逐和屠杀一再鼓励引进一再驱逐和屠杀的模式是西方对付诸如华人等世界其他移民族群的一种规律。再次,早期西方列强通过澳门对华人实施的“苦工奴隶贸易”,也对华人移民产生一定影响。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合法留居权,而早期葡萄牙人在亚洲所开展的国际贸易实质上是一种转口贸易。到16-17世纪中叶,由于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促成了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同时,澳门也成了中国人移民的重要出口港,特别是早期的契约劳工移民和变相的掠奴贸易。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时,也曾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劳工贸易活动。[5](P151-169)

应该说,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体系的上述变迁,在动力、空间与规模等方面都对华侨华人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1500-1800年间华侨华人体系的发展特征

1500-1800年间的华侨华人体系仍以东南亚地区为核心范围,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其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华商网络的中心和基地外移,华商网络的空间和市场不断扩大,华商的角色和性质也发生

不断的变化

华商网络外移的主要动因有三点:第一、中国明清王朝时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华商网络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是华商网络转移的内推力。第二、西人的介入扩大了东亚地区的区域贸易,同时东亚地区贸易的重心也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并使当时的东南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世界贸易活动中心之一。[6](P284)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不仅华商与西人之间的走私贸易大大增加,而且也推动华商参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这是华商网络转移的外拉力。第三、西人在东南亚地区的鼓励政策和新经济种植业的发展为华商网络的转移提供了立足的条件。这期间华商网络的发展特点有:第一,华商网络的中心和基地由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向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港口城市转移;第二,华商网络由东南亚沿海城市向各大陆和群岛国家的内地延伸和扩展;[7](P79-81)第三,华商网络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单一的商业贸易转向商品贸易、种植生产和采矿等范围,从而促进华商的角色变化更趋向多重性,即由原来的单一供应商角色向供应商、生产者和中间商以及消费者等多重角色转变。例如,移居爪哇的中国商人,既是中国商品的供应者,又是当地土著人与西人贸易的中间人。在东南亚海岛殖民地,华商也积极适应西人的贸易方式,包揽了几乎一切零售商业。华商网络及华商角色的以上变化促发了华人经济性质的改变:第一,华人经济在所在地的地位日益上升。据记载,在1740年之前,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基本上由华人控制,其制糖业也一直由华人支配。在巴达维亚,华人是当地出产的大米、糖和烧酒的主要经营者;[6](P264,287)第二,华人经济和华人社会日益同所在国的经济和社会相融合,由外来者向本土化发展。以上事实主要说明,华人不仅在东南亚扩大的贸易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历史发展与所在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当然,两种不同世界体系下的华人经济的意义是不一致的。在大陆独立国家里,华人经济是其所在地国家经济中的一分子,而在海岛殖民地,华人经济则隶属于殖民经济体系之下。

(二)华人移居群体由“点式体系”向“网式体系”发展

这期间,华商网络的发展与华人移民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华人移民的方向不仅随着西人在东南亚地区商业中心的发展而移居,特别是随着华商网络的扩展而扩大。例如,荷属巴达维亚商馆和西属马尼拉商馆的建设者大多为华人。当时华人移民的主要居留地是荷属的爪哇、西属的马尼拉、泰国、西加里曼丹岛和马来半岛的东南部。据记载,在1740年事件之时的巴达维亚有华人近3万,在1603年和1638年两次大屠杀事件之时的马尼拉地区都有近3万华人。到1621年时,马尼拉帕里安区的华人约有15000名,1636年时约有30000名华人。[6](P301)在17世纪的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时期(1350-1767),有华人近1万,而到郑信统治下的吞武里王朝时期(1767-1782),住居暹罗的华人达到近10万人之多。他们分布住居在暹罗境内的各个地方,其中以大城、北大年、万佛春和宋卡等地为主。[8](P90-93)据中国航海家谢清高在其《海录》中记述,在18世纪后期,在马来亚各邦有数以万计的华人从事贸易和商业活动,槟榔屿一带有万余华人从事胡椒种植,从马六甲到雪兰莪有许多华人从事锡矿的开采,在马来亚东岸的吉兰丹有许多华人从事金矿的开采;在加里曼丹岛西岸的坤甸到山口洋、三发等地,从事淘金、钻石、贸易和耕种等行业的华人常有数万人。其中,1777年成立的兰芳公司就是典例。[9](P42-43)另外,随着新经济种植业的引入和商业零售业的发展,华人移民群居区也逐渐由沿海城市或城镇向乡村发展。这样,由城镇和乡村连接的商业网络促成了华人群居的“网式体系”的区域分布格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马六甲和东爪哇地区对华人实行“甲必丹”制度,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将华人统一划定在特殊的区域等制度对华人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华人移民的形态趋向多样化

在1500-1800年间,华人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方式仍然以商业贸易为主,华商形态仍旧占华人

移民的主流。但在外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其他形态的移民方式也为华人所表现。他们是种植业移民(海岛地区新经济作物的引入和大陆地区农业的发展需求,还有华商从胡椒等重要商品的贸易领域转向其生产领域等因素)、技术移民(大陆地区手工业发展之需求,包括陶瓷业和航运业等)、商贩业移民(海岛地区零售业的发展及华商网络市场发展之结果)、与华人社会相伴发展的服务业移民(家庭小工、洗衣业、餐馆业和妓女等,同时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也都离不开华人的服务)、劳工移民(18世纪马来半岛和西加里曼丹岛的锡矿和金矿的开采)、政治移民(社会动乱及王朝的变迁)等。这些形态的华人移民与华商所从事的贸易行业密切相关。

(四)华人社团组织初现雏形

法国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曾说,“文明产生于聚居”。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人口集中几乎一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实现重大质变的前提。大约在17世纪时期,在东南亚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寺庙或宗祠为中心而形成的华人团体组织。这些组织机构简单,人数不多,但却主持和管理当地华人的日常生活风俗活动,并作为当地华人代表与殖民官员进行交涉。这些组织的另一特点是,它以华人来源地的方言为纽带,代表该方言集团的利益。在17世纪的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团组织雏形的主要代表有两个。一是大约成立于1650年的荷属巴达维亚地区的金德院,二是大约建立于1673年的马六甲地区的青云亭。这两个组织的性质相似,且交往关系密切。[10](P184-187)[11](P26-29)总之,华人社团的诞生是华人社会走向成熟的新起点和主要标志。

(五)华侨华人在国家关系中成为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就国家关系而言,1500-1800年间的华侨华人体系有时是主体,有时是对象,有时是角色。例如,在中西关系的交往中,华侨华人就作为一种载体而为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对象,这种作用自葡萄牙人与华商于1509年在马六甲首次接触而开始。在早期的中西直接对抗中,华侨华人是维持中华传统利益的主体,虽然华商不为当时的中国王朝所认可,但在早期的西人眼中,华商就是中国的一个代表。否则,西班牙和荷兰在菲律宾和爪哇对华人进行大驱逐后,就不会有对来自中国的报复之担忧^①。在东南亚海岛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华侨华人作为一种外来的现实力量的存在因素,对其所在地或国家的殖民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殖民化的速度和深度上,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上。总之,这期间的华侨华人游离于国家关系与国际关系临界线内外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总之,这时期华侨华人体系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移民数量规模化、华人社会组织化、华人经济本地化(包括生产、经营和属性等方面)、移民形态多样化^②。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1500-1800年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向全球扩张的大历史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已被西方力量强行“嵌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外部领域,西方列强的渗透作为一

^① 西班牙和荷兰曾分别于1603年和1741年修书予明朝中国地方官员和清朝乾隆皇帝,对1603年的马尼拉事件和1740年的巴达维亚事件表示解释和谢罪。参阅李长傅等著《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209-210页。

^②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分析1500-1800年之间的华侨华人历史时,明末清初时期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所谓“华商海盗”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所谓的“华商海盗”的组织、成份和性质是十分复杂的。笔者认为,将被武装起来的华商简单地贴上“海盗”的标签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不负责任的附会,我们应从特殊的历史背景视角来看待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华商群体。

种现实因素给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然而,由于朝贡体系这一特殊因素的存在而使东南亚地区的殖民进程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征。在 1500 - 1800 年间,资本主义经济体对朝贡体系的最外围——东南亚地区的海岛国家采取的是武力强占的方式,对中间层的东南亚大陆地区则采取相互利用的对策,对中心地区则采取顺应的策略,从而形成东南亚地区两种世界体系竞争、利用与共存等多种形态并进的复杂局面,由此衍生了东南亚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支——东南亚华侨史也自然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参考文献:

- [1] 龙向阳.世界体系思想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意义[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1):54--59.
- [2] 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译本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4]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5]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6] [美]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7]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8] 薛君度,曹云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 [9]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华侨志[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10] 梁英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 [11]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范宏伟]

Inter -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1500 - 1800: An Analysis from World -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Xiang-yang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thoughts of World - system,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as inlaid into the periphery of capitalistic economy system by the Western powers during 1500 - 1800, which was a special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eriod when the Tribute System and Capitalistic Economy System competed with and utilized each other and coexisted in Southeast Asia.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the inter -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against the abov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shaped by them.

Key words: 1500 - 1800; the inter - state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n;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world - system perspective